

朱汉民 著

湘

A

学

General Survey of the

通

Xiang School

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湘学通论

朱汉民 著

XIANGXUE TONGLUN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湘学通论 / 朱汉民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04-044067-6

I. ①湘… II. ①朱…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4369 号

策划编辑 杨 莉
责任校对 吕红颖

责任编辑 杨 莉
责任印制 韩 刚

封面设计 张 楠

版式设计 童 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067-00

前言

“湘学”的概念是历史形成的，“湘学”的研究领域与学科内涵是一个与中国学术史、传统国学密切相关的范畴。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形态而波澜迭起的历史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形态而风姿各异的地域学术传统。而本书通论的“湘学”，就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形态之一。

早在宋代，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与“湘学”相关的“湖湘学”“湖南派”的地域学术、地域学派概念。到了清代、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研究湖南地区学术文化史时，比较普遍地使用“湘学”的概念，从而逐渐形成了“湘学”的研究领域和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近年来，“湘学”研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大量“湘学”的个案研究、通史研究、文献整理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各种会议、课题在不断开展，许多高校与研究单位也创立了各种湘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我们确实迎来了湘学研究的大好时代。

其实，湘学的历史已经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被学界关注并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朱熹的《胡子知言疑义》就是一部研究、评论湘学的著述。由于清代湘学的地位空前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留下许多文献与论著，因此，湘学研究更是受到此后学界的关注，相关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当代学者更是成为湘学的主力军，为湘学研究做出了主要贡献，使我们在今天能够读到大量湘学的个案研究、通史研究、文献整理等方面的成果。

但是，面对诸多的湘学研究成果，我们感到尚有许多未解决的重要学术问题。特别是作为一门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的湘学，还有一些基本的学术范式、学理构架均没有建立起来。如果真正建立起湘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学理构架，必须能够回答和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作为一门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湘学体现出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是什么？作为地域学术形态的湘学的个性又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确立、如何看待湘学的共性和个性？当我开始写作《湘学通论》时，就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既然要通论湘学，就首先要通论湘学的共性和个性。正是这一基本的问题意识，启动了我的《湘学通论》研究与写作。

确实，要通论作为一门中国学术史分支学科的湘学，就必须把湘

学与中国学术史结合起来。湘学是中华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渊源、形成、演变、发展均是在中华学术文化的大框架之中，并且与其他区域学术形态的交流、融汇过程中发生的。故而，无论其他地域的学术在湖南的传播、衍化、交流，还是湘学学者在其他地域的交流、传播，均是本书研究的内容。地域学术形态的研究切忌将其孤立化，必须坚持以湘学与中华传统学术关系相结合作为原则和目标。一方面，作为中华学术体系组成部分的湘学，总是随着中华学术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从而形成、发展地域形态的学术思想，并且具有中国学术史的一般内涵，能够对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湘学作为一种地域学术形态，具有“湘”的地域因缘，其演变发展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表现出区域学术形态的特质，故而也要充分把握湘学的地域性特征。

湘学与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既是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是一种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因此，本书在开展对湘学的研究时，既要充分探讨湘学作为局部的、具体的文化形态的特色；也要探讨这种区域学术形态对中华学术文化的表达和贡献。事实上，湘学的地位、影响总是与它对中华学术文化的表达和贡献有关。尤其重要的是，湘学体现出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与作为地域学术形态的个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地域学术形态的个性中表现出中国学术史的共性，中国学术史的共性又总是要呈现在湘学的地域化个性特色之中。

本书的任务是对湘学做一贯通全局的概述。展开对湘学综合性的研究，就必须将湘学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总体把握。因此，本书重点研究的问题有如下两个。这两个问题均体现出湘学形态中的中国学术史共性与湖湘地域学术史个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一，湘学学统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空间形态组成部分的湘学，有上千年的历史。纵观绵延千余年的中国传统学术史，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潮，均在湖湘大地传衍，并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一些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派。同时，在湘学学术的演变发展中，还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如两宋时期包括闽学、浙学、赣学就先后传衍于湖湘大地，对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又如明代，盛行于长江流域的阳明学（具体又包括浙江王门、江右王门等）、湛学、东林学在湖湘大地传播，对当时湘学亦产生很大影响。清代同样如此，乾嘉汉学的吴、皖两派，以及常州派、桐城派等当时主流的学术形态，均在影响着湘学的学术形态与知识旨趣。

既然每个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的学术思潮在湖南传播，令人感兴趣的则是，是否有着一脉相承的湘学“学统”？其实，湘学作为中国区域性传统学术形态

中的重要一支，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实际上，我们将这一学术传统相继的不同学者、学派、学说统称为湘学，就是强调这些不同时代的学术之间有着一以贯之的“学统”。本书特别关注湘学的学统问题。我们认为，作为湘学通论的著作，必须重视湘学的学统问题。区域性学统是由奠基学术、开创学派的学术宗师与传承学脉、发展学术的后学构成的。那么，学术宗师与后学之间的脉络、系统必须靠学统才能联结起来。研究探讨湘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应该在此基础上考察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并以此展开对湘学的综合性研究与思考。

湘学学统不仅是学术地域化的追求，也是中国学术史共性的追求。因为“学统”总是与“道统”联系在一起的。湘学学者在标榜“学统”时，往往强调这一学统的正统性，即这一学统在中华道统史上的特别地位和贡献。所以，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过程，也是湘学学者追求、认同中华学术文化正统性的过程。只因如此，湘学“学统”的研究范式，才能够让我们思考湘学体现出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与作为地域学术形态的个性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湘学学统的建立，既体现湘学作为地域学术形态中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也体现中国学术史的共性如何呈现在湘学的地域化特色之中。

其二，湘学的学术旨趣。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湘学学统的依据是什么？湘学的“湘”不应该只是一个装有各种不同学术文化的空间框架。实际上，我们将这些不同时代产生于湘学学者的学术思想统一称为“湘学”，还在于它们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方面存在许多的相似性。应该说，它们内在的学术旨趣是其中十分关键的因素。这种学术旨趣成为“学统”的核心学术价值，并通过一代代不断积淀，成为一种稳定性较强的区域性学风。

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潮不一样，每一学派的话语体系不一样，每个学者的知识结构也不一样，但是，如果追根溯源，这些差别与他们最初探求知识的目的、兴趣有关。如果能够在学术旨趣上找到他们相似的地方，其实也就找到湘学大家庭中所有成员之间相似的最重要依据。我们虽然可以放弃对湘学学者的普遍本质、共相的规定，但是并不妨碍对他们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方面相似点的寻找。学术旨趣的差异一般会受时代思潮（时间性的社会条件）影响，但同样会受地域传统（空间性的社会条件）所制约，不同地域的学者、学术形态会在学术旨趣上存在差异。

同样，湘学学术旨趣形成，不仅体现湘学的地域化特征，也体现中华学术文化的一般性追求。中国传统学术旨趣往往体现为道、治、学的普遍追求，但是，不同地域的学术传统往往会表现出对道、治、学不同的学术宗旨、知识兴

IV 前言

趣，从而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旨趣。这样，湘学学者之所以形成对道、治、学相同的学术旨趣，不仅体现出湘学学统的地域化特色，也体现出追求道、治、学统一的中华学术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来通论湘学，正是希望探索作为中国学术史分支的湘学，充分揭示湘学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与地域学术形态的个性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朱汉民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上 篇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学术旨趣与地域学统·····	12
第三章	湘学的源流与学统·····	28
第四章	湘学的学术旨趣与湘学学统·····	40
第五章	湘学学统与旨趣的形成条件·····	53
第六章	岳麓书院与湘学学统·····	67
第七章	濂学的诠释与湘学的建构·····	93
第八章	船山学诠释与湘学转型·····	108
第九章	湖湘实学传统与近代化转型·····	129

下 篇

第十章	周敦颐的学术旨趣·····	145
第十一章	胡安国《春秋传》的学术旨趣·····	162
第十二章	湖湘学派的学术旨趣·····	174
第十三章	王船山的道统、治统与学统·····	193
第十四章	魏源学术旨趣中的近代因素·····	209
第十五章	曾国藩礼学的学术旨趣·····	221
第十六章	郭嵩焘的学术旨趣·····	235
第十七章	谭嗣同学术旨趣的近代追求·····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8
名词索引·····		263
后记·····		265



上篇



第一章 绪 论

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形态而波澜迭起的历史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形态而风姿各异的地域学术传统。本书通论的湘学，就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形态之一。

作为“中国传统地域学术系列丛书”之一的《湘学通论》，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湘学”进行贯通全局的概述。在通论湘学之前，首先讨论几个问题：什么是本书讨论的湘学？湘学的主要特点和贡献是什么？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第一节 湘学的概念

本书将通论湘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湘学？关于湘学的定义，学界一直存在多种看法。但是本书讨论的湘学定义是比较通用的，即湘学是湖南地区所形成的传统学术文化。湘学的“湘”是指湖南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传统学术思想。

湖南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各个历史时期发展不平衡，并且各具历史特点。从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来说，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主要有两大高峰。第一大高峰形成的时间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湖南地区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其作为文化高峰的标志是出现了屈原等浪漫主义的艺术文化。但由于湖南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故学术界将这段时期的文化称为“荆楚文化”或“楚文化”。在当时，“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郢、淮。”^① 楚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圈，其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今日的湖南地域。湖南地区文化发展的第二大高峰是两宋至明清以来，其文化标志是天人之道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文化。由于唐、宋以后该地常常被称为“湖湘”或“湖南”，更由于此时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质，所以学界把这段时期的文化称为“湖湘文化”，其核心文化的学术则称为“湘学”。

^① 刘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兵略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7页。

湘学是一个特指的学术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唐宋以后形成的湖南地区的知识传统。学界一般是以两宋时期的周敦颐，胡安国、胡宏父子作为湘学的开端。他们的学术是湘人之学或产生于湘地之学，也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后来许多人在论述湖南的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时，常常将屈原、周敦颐并举。钱基博曾将楚之屈原和宋之周敦颐称为湖南的“两巨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①其实，屈原和周敦颐恰恰是湖南的不同历史阶段区域文化的两个代表人物。屈原是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文化成就既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楚文化的骄傲。他的代表作品《九歌》《天问》《离骚》《招魂》等，是在充满浪漫神话传说的楚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又使楚文化的光彩更加辉煌夺目。因此，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和标志，从屈原身上，反映着楚文化的主要形态——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神奇幻想等特色。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由他开启的理学学术，成为宋明时期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潮，不仅使中国古代的断代文化——宋元文化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也预示着湖南的地域学术文化——湘学的生成，并决定了湘学的形态最初是一种理学型的学术文化。

周敦颐的出现，对于湘学来说，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正像他的《太极图说》《通书》象征着理学的兴起一样，他作为一个学术成就卓越的湖南学人，亦象征着湘学的兴起。此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被学者称为“理学之邦”。从开创理学到总结理学的数百年间，湖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们大多是理学家，除了开创宋明理学的周敦颐是湖南人外，总结宋明理学的王夫之也是湖南人，他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人称其为“船山先生”。南宋时还在湖南形成了与闽学（朱熹）、江西学（陆九渊）、婺学（吕祖谦）并称的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张栻等）。记载湖南学术思想史的《湘学略》一书，首以“濂溪学略”（周敦颐）开篇，接着有“衡麓学略”（胡安国、胡寅、胡宏）、“南轩学略”（张栻）、“岳麓学略”（胡大时等）、“船山学略”（王夫之），这些人都是学术史上有影响的理学家。可见，湖南很快就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开创了区域性的学术文化，并决定了这种学术的内涵和特质是一种以理学为主导的学术文化。

湘学的形态在宋代就完全形成，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对此有一段精详的论述：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

^① 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诖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歆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①

可见在宋代，理学已经大盛于湖南，并形成了以理学为主体的湘学。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个朝代，这种知识传统与区域特点一直保存下来，得以延续、发展。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曾经历心学思潮、汉学思潮的主导和演变，但是湖南的士大夫仍笃宗理学，津津乐道于“理学之邦”的学术传统。所以，尽管乾嘉汉学风行天下，“湖南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闲，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②

湘学为何形成于宋代呢？屈骚等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形成，是由于南国的原始神话、图腾崇拜、历史传说等源远流长的楚文化背景。那么，两宋以后，湖南能形成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的新儒学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这必须联系中国文化演变的大背景来考虑。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演进：第一，理学思潮的兴起；第二，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第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演进是湘学得以形成并大放光彩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第一，理学思潮的兴起。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其主要特点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此外，它又大量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道，适应了

^① [宋]真德秀著：《劝学文》，《西山文集》卷四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2页。

^② [清]罗汝怀著：《绿漪草堂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九年（1883）罗氏常课本，第523页。

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发展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可见,自两宋以后,理学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理学的形成本身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向更高层次综合发展的体现。

第二,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就产生于北方,自晋唐以后特别是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加之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占据中原,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一切迫使中原地区士子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逐步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了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那些有名的文人学者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北宋形成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在南方和北方各两所,而“南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即已全部移到南方。这时,文化重心南移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

第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湘学的形成是在两宋时期,它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史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即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也很鼎盛,但汉代儒学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它首先通过国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太学,以研究和传播儒学。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汉代儒学的地域色彩不强。而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宋学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孙复的泰山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邵雍的百源学,司马光的涑水学,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到了南宋,又有朱熹的闽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吕祖谦的婺学,陈亮的永康学,薛季宣等的永嘉学等。各个地域的儒学学派均有各自的学术师承、学术基地、学术传统。

在理学学术思潮的兴起、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及儒学地域化这一大文化背景

之下，湘学开始形成并崛起。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的出现；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学术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并决定了湘学的形成和崛起主要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江南各省的理学得以蓬勃发展之日，也是儒家文化迁移、渗透于南国并形成地域特色之时。两宋以后，有称福建为“海滨邹鲁”者、称湖南为“荆蛮邹鲁”“潇湘洙泗”者，皆反映了以“邹鲁”“洙泗”为标志的儒家文化在江南各省的深入渗透，使原来扎根于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开始在江南扎根。

第二节 湘学的主要特征

湘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学术形态的特质是什么呢？这是从事地域学术研究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首先讨论湘学的一般性特征。

湘学的形成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如果对湘学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它的内部包含的基本要素及其特征。综合湖南宋元明清各代的思想观念、学术风尚、人才特色、教育理念，可以发现湘学具有下列一般性特征。

一、推崇理学

本来，宋理宗以后，理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在社会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推崇理学并非只是一种区域学术现象。但是，湖南推崇理学，有区域方面的原因和特点。湖南的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在以前一直处于冷落寂寥的状态。宋明理学产生后，湖南一跃成为“理学之邦”。理学开山周敦颐是湖南人，并在湖南讲学。尤其是南宋以后，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于湖南创办书院讲学，形成了以“湖湘”称名的地域学派。加之他们的弟子又在湖南各地讲学，传播理学，这样，理学不仅作为学术思想而受到士大夫的广泛崇奉，还渗透日用伦常、社会习俗中去了。后人评价湖湘弟子在地方传播理学的影响时说：“彪氏虎臣父子及周氏奭讲明正学皆其卓卓尤著者，流风余韵，景仰至今。我朝一道同风，家弦户诵，湘上儒雅之风，固已蒸蒸日上矣。”^①正由于湖湘学派广泛深入的影响，数百年以来，湖南一直标榜理学为

^① [清]齐德五等修纂：《湘乡县志》卷二，《风俗》，清同治八年（1869）版，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4页。

“正学”，并以其激励、劝勉湖南的士子。这些士大夫、官吏以理学劝学时，尤其重视以湖湘学统激励士子。宋理宗时，汤汉就以湖湘学统劝勉衡阳学子，他说：“衡之士，欲知学之本乎！则有文定胡公与敬夫张子之书具存，其所以绍濂洛之统，启苏湖之传，真间世之师也，学者宜尽心焉。”^①他要求在湖湘学者的著作中探寻为学的根本。理学家真德秀安抚湖南时，专作《劝学文》，要求湖南士子潜心理学，他也主要从湖湘区域学统方面勉励士子，以湖南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人的成就，证明湖湘学统源远流长，他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②由此可见，胡、张等理学家创办书院、形成学派，使湖南形成崇尚理学的传统，这是湘学推崇理学的区域方面的原因。

上述区域方面的原因，又导致湘学的区域特点。当全国的学术思潮、文化教育发生重大变化时，湖湘地区仍谨守张栻、朱熹学统。明中叶以后，阳明学派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在湖南讲学，但又受到传统的湖湘学风的制约和影响。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清初三大儒，唯有王夫之成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以至于人称“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③清乾隆以后，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风行天下。当然，汉学思潮也影响到了湖南，甚至有一些湖南学者研治汉学很有成绩。但他们绝不会像吴、皖等地的汉学家那样，把汉学和理学对立起来，相反，他们仍坚持以义理之学为本，肯定理学和汉学之统一。王九溪是乾隆年间一个汉学家，但是他仍然坚持以性理之学训诲诸生，在他手订的《岳麓书院学箴九首》中，仍以“存诚养志”“变化气质”等告诫诸生，他说：

力学何为，变化气质。气质有偏，好恶斯辟。惩忿窒欲，式砭其疾。严肃整齐，下手要术。^④

这个“考古最悉”的汉学家以理学的“变化气质”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正是崇尚义理之学的湘学传统的体现。道光年间创办的湘水校经堂是湖南汉学的主要基地，但创办者吴荣光认为校经堂的学术主旨是汉宋并重，主张“奥

① [元]汤汉著：《先贤堂记》，[清]旷敏本纂：《乾隆衡州府志》卷三十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31页。

② [宋]真德秀著：《劝学文》，《西山文集》卷四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2页。

③ [清]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案》，清光绪十年刻本。

④ [清]王九溪著：《王九溪先生学箴九首》，邓洪波整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60页。

衍总期探郑(玄)许(慎),精微应并守朱(熹)张(栻)”^①。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皆以重经济之学称世,但他们仍将理学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人称其“笃宗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或称之为“理学真儒”。^②曾国藩等人以经济、训诂、辞章称世,但是,曾国藩本人则坚持义理之学是其他一切学问的根本,他说: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③

曾国藩的主张典型地体现了崇尚理学的湘学传统。湘军集团的主要将领均是儒生出身的文人学者,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均是封疆大吏,但又推崇理学,以理学治军,是一代理学名臣。罗泽南还在军务繁忙中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理学著作。

二、强调经世致用

注重经世致用,向来就是湘学传统的重要特色。湖湘学派是一个具有强烈经世倾向的理学家群体。胡安国持《春秋》经世说,通过注释《春秋》宣传康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胡宏的《知言》亦以重济世为特色,声称要振兴“经济学”;而张栻及其弟子也皆以抗金救国、经邦济世的成就而闻于一时。湖湘学派这种经世致用的特色,发展为一种区域性的学术传统。

明清以后,湖湘人才层出不穷,他们大多以经世致用的主张和成就称世。王夫之是著名的学者,但他以抗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以后,才潜伏下来,通过研治学术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晚清以来,全国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复杂,湖南也是如此。尽管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悬殊,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湖湘学人的共同特点。陶澍,魏源,贺长龄、贺

① [清]吴荣光著:《湘南述别四首》,邓洪波整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07页。

② 李肖聃著:《湘学略·二贺学略第十三》,《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8页。

③ [清]曾国藩著:《诗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86~487页。